

最近，看到一些材料，其中有的说法，值得研究。由此引
话，有的是老话，有的是新想起来的，之间往往没有什么联系，

重中学科性质

所以说是“重中”，因为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已经说过

张静如 著

张静如文集

第三卷

说法，在今天研究中共历史的圈子内仍然存在。本来谁爱怎样认识
的自由，别人不能也不必强迫。问题是这些说法不科学，所以还必
受，那是另一回事。

比如，说是“政治性非常强的历史学科”，就把学科性质和学科

个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属性，一般说来这种根本属性只有

海天出版社

张静如 著

張靜如文集

中夏



海天出版社

《蒋氏父子在台湾》序

记得抗日战争一胜利，沦陷区的老百姓就盼着蒋介石赶快回来。可是，等真回来了，老百姓却大失所望。因为国民党在抗日战争后期腐化了。随后，国共合作破裂，打起仗来，老百姓不再支持蒋介石。结果，共产党把蒋介石赶出了大陆。看来，执政党腐化，自己不救治，难免政治上失败。那么，蒋介石“偏安”台湾之后怎么样了？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继统”之后又怎么样了？大陆上的人不是太清楚。台湾出了一些有关的书和文章，但多属片断记述，不甚系统，且一般人难于看到。我的学生李松林对国民党史素有研究，所看资料甚多。近年来，他搜集大量港台报刊和书籍，经过研究，写成《蒋氏父子在台湾》。

这不是一本小说，也不是历史人物研究的专著，而是蒋氏父子在台湾政治活动的历史纪实。惟其如此，它既给愿意充实点历史知识的朋友们增添一本业余读物，又为专门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些可靠的材料，可谓雅俗共赏。

说到充实历史知识，很想讲点题外的话。一个有教养的人，总应该有一定的文学、历史、法律、经济、哲学等方面的知识，这对工作和社会交往都有很大益处。朋友聊天，人家一张口显得学识渊博，自己却一无所知，实在太难为情。读历史知识方面的书，不能追求情节生动，而应注意它的真实性。凡是把情节写的活灵活现的历史记述著作或文章，大部分是夸张、臆想出来的，切不可信。话说回来，《蒋氏父子在台湾》在这方面就做得比较好，它力求真实，不虚构夸张。是不是因为我与作者有师生之谊，就帮他吹牛呢？不

是。据我所知，他翻阅了蒋氏父子的著述、讲话、答记者问、书信、文告、日记等第一手材料，也看了许多回忆录、评论，故所记事实，均有出处。当然，书中也有个别推想，如一开头就说蒋介石“沉思良久”，“眼前又浮现出一幕幕在大陆失败的场面”。这纯是臆想，不可信。好在类似蹩脚之处极少，不碍大局。

书中对蒋氏父子政治活动的记述，较为客观、公允。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能因为过去一直敌对就骂到底，也不能因为现在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就尽量说好话。所以，书中既揭露了蒋氏父子“反攻大陆”的反共活动，记述了他们维持蒋氏统治的传子活动，也写了台湾社会从混乱到经济稳定、起飞的发展过程。书中对蒋经国晚年所进行的“政治革新”、“解除戒严”、开放大陆探亲、反对“台独”等活动和措施，都给予应有的肯定。由于体例的限制，书中没有对蒋氏父子在台湾的政治活动深入地作出深入的、经济的、文化传统的以及个人心理上的导因分析。

看了这本书，使我增长了不少知识。通过对蒋氏父子在台湾政治活动的了解，也使我发生不少感想。如他们同民众的关系，确实跟在大陆时不大一样。看来，是政治失败逼他们不得不改变做法。又如蒋介石总死抱住“反攻大陆”的信念不放，很不实际，结果至死台湾也未治理好。蒋经国则不同。他立足于脚下，从实际出发，力争把台湾治理好，改革图强，效果显著。这类问题，都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所以，我认为，这本记述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人物蒋介石和蒋经国在台湾政治活动的书，还是值得一读的。

（原载李松林著《蒋氏父子在台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6月版）

【评文纪事】

台湾问题是复杂的，目前台湾的政治局面与这本书出版时有很大的不同。国民党、新民党作为在野党正努力加强自己的力量，同“台独”势力进行斗争。当然，这是很艰难的。但是，人们确信，凡阻碍统一的势力都没有好下场，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

李松林是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除负责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之外，仍然从事台湾问题研究。

2006年1月

宏观把握毛泽东

从社会整体研究历史，从宏观上把握毛泽东——这是张教授近些年大力倡导的。当面听听他的宏论，早就是我们的夙愿。“因为家里有点事，我大半年不接受采访了，对你们是个例外。”教授见面如是说。于是跟着他的思路，我们上了一堂机会难得的课。只是先生说得兴致，一个半小时竟未喝杯茶。

访问人：张教授，请您就如何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问题，谈谈您的看法。

张静如：这些年，我有一个总的观点，就是认为不论研究人物，还是研究历史，一定要从整个社会的总体上来看问题，因为不论一个政党还是某个历史人物，都是在这个社会产生的，并且在这个社会中活动，他不可能离开社会。只有深入地去研究整个社会，才能够把政党（无论是他的人物还是他的实践）研究深透。

访问人：您觉得现在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状况如何？

张静如：从发表的文章以及论著看，在量上是很大的，你们不是有个统计：三中全会以来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论文有六千篇，著作有四百多部。但我不客气地认为，过去的研究相当程度上停留在宣传上，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开展研究是太差了。因为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是跟党史的研究联在一起的。而党史的研究又跟党史这门学科的历史发展有关系，民主革命时

期不可能也没有条件进行这种研究，它需要适应直接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政治宣传，那么，关于党史问题它就总是比较简单地说一下历史背景呀什么的，然后是直接的政治宣传。建国后条件有所变化，但也要一般地向群众灌输党史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上什么研究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党史这门学科比较过早地进入教科书化。许多学科的发展都有一个规律，就是在它自身发展之后，进入教科书的模式，但这有个酝酿和发展过程。而中共党史这门学科比较早地进入了教科书化，这也不能赖谁。因为在建国初由于形势的需要，对党员和知识分子的教育，需要有个教本，这就促使这门学科过早有了教科书。有了教科书就有了一定的模式，再深入就有了困难。我觉得，既然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那么回过头来，就应该研究它形成的弱点，尤其是展开对于社会的研究，这是深化党史研究的一个途径。

那么回到我们的题目上来，我们说应该宏观把握，这就是说，要研究人物，就一定要从他处的社会的各个方面来考虑。而所谓社会的各个方面也就是要从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一直到包括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社会意识、社会心理、思维方式等社会的侧面来研究。考察一个人物，还要考察包括他的家族的变迁，人物的变迁等等，只有从这些方面考察了这些问题，然后才能看出一个政党，一个人物，他是怎样活动的，他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包括毛泽东这样的大人物，对他的研究也要从社会生活的诸方面因素去加以考察。我们现在的研究，还缺乏整体的考察。比如，毛泽东出生以后，整个社会和他的思想的产生是什么关系？他的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是什么？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对他有哪些影响？在我的研究中，我比较强调社会心理的影响，就是说，社会心理对于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形成是什么关系，以及他接受马克思主义，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社会意识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社会意识形态，一个是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形态是属于系统化的社会意识，而社会心理则是一种非系统化的社会意识。社会上的质的属性，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等，它并不首先反映并形成社会意识形态，而是首先反映为社会心理，形成简单的东西。社会意识形态是高于社会心理的，它是从社会心理的基础上总结和升华上去的，成为一种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而社会存在反映到社会心理，又表现为

社会的群体心理。

访问人：这是不是说，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或者说，他自觉不自觉地从社会心理上认识和探索中国国情了？

张静如：我没有查到毛泽东是否曾用过“社会心理”这个词，但同时时代的李大钊是用过这个词的，他说，要注意农民的意识，“此种基础社会之心理，实有以秘持真正舆论之权威”，故“不可漠视”。对毛泽东，我没有深入的研究，但从宏观上看，他是有这种基础的东西的。所以，要深化毛泽东的研究，我想，一个是从整个社会去看，另一个是注意社会心理对他的影响。比如从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这一段，当时的社会心态到底有怎么样的特色，这些特色跟毛泽东思想的转变有什么关系，如能进一步探讨，是很有意义的。

访问人：研究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挖“源”，现在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毛泽东的思想之源，一个是从西方来的，包括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在相当程度上他又首先受湖湘文化的影响，因为毛泽东生在湖南。而您刚才讲的从社会心理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转变，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

张静如：我并不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作用，包括湖湘学风也是这样。问题是传统文化发展到近代，它也要跟整个世界的发展相联系，并跟随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传统文化的发展也是不断总结社会心态并使之升华。比如，中国近代工人运动的发展也要跟社会心态相联系，社会心态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愿望、要求、情感，等等，这些都属于非系统化的意识，好、坏、美、丑，都是一些比较模糊的东西。

访问人：就是说，从它的表面看是初级的？

张静如：对。工人运动开始也是一些初级的东西，主要表现为反抗意识。

访问人：反抗意识能不能说已经包含有意识形态的层次呢？

张静如：仅仅是社会意识，还没有升华，升华就成了意识形态了。作为社会意识，从社会心理上讲，有民族的、阶级的、职业的。相同职业有相同职业的心态，相同阶级有相同阶级的心态，各阶层有各阶层的心态，整个民族有整个民族的心态。

访问人：到了近代，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社会心态是什么呢？它对毛泽东

有什么样的影响？

张静如：我认为，从大的方面说，有两个：一个是接受和吸收了外来的文化，这主要是西方的东西，那时，不管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都介绍到中国来，都予以接收。另一个是传统文化中有用的东西。从社会心理方面具体说有以下几个：一个就是从鸦片战争以来慢慢在全民族中形成的反抗意识和救国意识。这两个是相通的，既是反抗侵略又是救国。但这种反抗意识还没有上升到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因为那是意识形态了。对外国的压迫我就反，这是普遍存在于群众中的心理。它们之间就差这么一格。不要小看差一格，这是客观的事实。假定没有这种普遍的群众性的东西，你那个意识形态或者思想体系，准是坐在屋子里脱离实际想出来的。这是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的东西。

第二个，是不满现实的情绪。这种情绪怎么来的呢？就是力图改变现实生活状况的愿望。当然，“不满现实”各阶级有各阶级的不同，各阶层有各阶层的不同，但从总体上看，都是要求改变现实，存在一个不满情绪，这种要求和愿望，也是在群众中普遍存在的。

由这两点，又决定了在社会心态上的一个特点，就是焦急情绪，焦急、迫切、赶快、急迫，等等；和焦急情绪伴随的还有一方面，即失落感，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失落感非常强，为什么？因为干了一次革命仍然没有成功，社会还是那样，压迫和被压迫照旧。在这种情绪下，有的人就沉沦下去了，而有上进心的人就产生了竞争意识，因此，失落和竞争又是焦急情绪的两个方面，既有失落，又有竞争。

访问人：知识分子中不甘沉沦的人们，或者说觉醒的人们，是不是就产生了要寻找真理、寻找图强自新的愿望？

张静如：这种东西在群众中也是普遍存在的，我这里讲的不是哪个人，而是普遍的社会意识，当然社会性也要体现在个人身上。所以由这种民族心理、各阶级阶层心理决定了的特点，在总结上升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一种迫切性、焦急性、竞争性，再上升一步，也就产生了适用性、应用性、功利性、开放性和实践性。

访问人：要有用的？

张静如：对，只要有用，拿来就试。这是在社会心理基础上上升为社会意识形态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特点。

我想毛泽东在他青年时期，在接受各种思潮过程中也是首先遇到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要深入研究毛泽东，就要从客观上把握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和一般社会心理基础。我再重复说一下，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社会存在反映的社会意识，包括两部分，即非系统化意识构成的社会心理和系统化意识构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在人们的相互交往范围内，存在着大量没有系统化的思想要素、某些片断，如关于“好”与“坏”、“公平”与“不公平”、“美与丑”等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半自觉”的模糊概念；种种日常生活习惯和风俗；有关社会生活的类似快乐或悲哀、赞赏和不满、渴望或绝望、期待或担心、支持和反抗等意向和念头。所有这些现象，在社会意义上称之为社会心理。当然，社会心理依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群体而不同。所以，社会心理有民族心理、阶级心理、集体心理、职业心理等等之别。简言之，社会心理是一定时期特定的民族、阶级或其他社会共同体中普遍流行的、共同的、典型的精神状态。它包括人们的要求、愿望、情感、情绪、习惯、风尚、情趣，等等。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的社会心理是另一种形式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想源泉，或称之为素材源泉。前者犹如一座文库，储存着大量没有经过加工的原材料，后者依不同需要任取一种或者若干种经过不同程序的加工而制出成品。所以，也可以说，意识形态是社会心理的凝聚物、结晶体。因此，我认为要深入研究毛泽东，也要从这个角度挖一挖。

访问人：那么，具体到毛泽东这个人，他有什么特点呢？

张静如：从毛泽东本身讲，他的个性特征或者说性格特色有以下几点：一个是求实，求实在毛泽东身上是很突出的，这同他生长在农村有关系，农民本来就是求实的。再一个是求异，所谓“求异者不苟同”。这里的求异不是说毫无根据的求异，毛泽东的求异是在求实基础上的求异。求异的特征就是发展起来不满足现状。农民很容易满足，毛泽东不满足，他一生中都有这个特征，是很突出的。同时他要创新，就必须实践，所以他总是经过实践之后加以总结，然后推广。从毛泽东的学风上说，在他的早期是求大本大源，他自己说：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所以，他又比较重视理论思辨，这跟湖湘学风以及清代汉学有关系，比较重视实践，这两个方面，既注重理论思辨，又重视实践，两种风格同时并存，交织在一起。

但单纯地求大本大源是要脱离实际的，容易陷入空想，在毛泽东的早

年也曾经经历过这个阶段，他就曾研究过克鲁泡特金的学说，认为应搞不流血的革命。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从当时的社会看，不只是他一个人，知识界就是不大喜欢暴力，这也是个传统，认为暴力是低下的东西。包括李大钊，开始也不主张暴力革命，他就搞了工读互助团。暴力总是简单的，如果革命能用和平的方式搞成功，何必去流血？所以，那个阶段他们从思想上是拒绝暴力的。那一代人，一开始是绝对不能接受马克思的暴力学说的，只能接受非暴力的社会主义的学说。这一点，不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特点，也要看到整个社会的共性的东西。后来经过争论，经过实践，才弄清暴力有两种，这才接受马克思主义。

访问人：那么，毛泽东的转变问题上，为什么他成功地转到马克思主义而没有转到无政府主义或其他方面去呢？

张静如：要回答这个问题，不仅要注意他个人的性格上的作用、个人学风上的作用，也要注意社会整体的作用。从毛泽东个人性格上讲，他注重社会实践，他善于在实践中做比较，他搞新村实验时是真心实意的，而且搞得很热闹，但经过实践总结，那样做是不成功的，行不通，还是走马克思的道路可行。1920年12月1日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有段话，说得中肯，表现了他那时的心境，他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封信可以说标志毛泽东已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封信中还是认为俄国式的道路是恐怖的，从心理上还是不能完全接受。

访问人：认为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张静如：不仅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且是没有辙了。时隔不久，一个月后的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毛泽东发言说：“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陈书农）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说白了，这话的意思就是只有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最有用，别的没用。毛泽东没有往无政府主义道路去转变，我觉得还跟他个人的性格特点有关，他求大本大源，这个大本大源求错了，再另求大本大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专门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也就是大本大源。别的方法、别的道路走不通了，自然也就选择了这条道路。那么这也就是实践性的，所谓“踏着

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就是他敢于去接受现实，别人不敢的他敢。所以，在毛泽东身上。“求实”、“求异”两个性格加在一起，就造就了他的历史作用。

（原载《说不尽的毛泽东》，辽宁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评文纪事】

1992年4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张素华、边彦军两位青年人找我，说要编一本有关毛泽东的书，想采访一下。当时正值我老伴骨折，所以采访一开始就说家里有点事。采访中，我强调要宏观把握，主要是要求从整体上去研究毛泽东，今天看也仍然存在从整体上研究不够的问题。访问中，我提到党史学科发展中的过早教科书化问题，这是我经常强调的，目的是提醒研究者注意，努力克服它所造成的缺陷。本文的观点都是我的，但成文是张、边二位之功，特此表示感谢。

2006年1月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历史命运》序

我历来主张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要研究近现代中国社会，而研究社会自应涉及各阶级。所以，我建议吴序光主持研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自此课题被教委批准后，经过近两年的努力，终于完成。粗读一遍，觉得不错，作者确实下了工夫，较以往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有所前进。全书结构严谨，文字流畅，既有全局描述，也有重点理论分析，富于时代气息。

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历史命运，书中已有实事求是的评价，不再赘述。这里，只想说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近现代中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因为我以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故而衡量社会各阶级的功过都应该以其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为标准。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得好：“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随着中国社会新的现代生产力的出现应运而生。这个阶级担负着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其政党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推翻了封建王朝，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但是，这个阶级生性软弱，易发生妥协、动摇，难于完成其历史任务，不得不由中国无产阶级所代替。自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产生后，中国民族资产阶

级及其政党的思想体系、政治态度、实践活动，大体上或曰基本上是与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奋斗的行程保持一致的。民主革命时期，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推翻反动统治，解放生产力作贡献。特别是这个阶级在维持和有利条件下发展现代生产力方面所做的贡献，应该载入史册。到50年代，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终于接受了历史的安排，这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很大的贡献。至于这个阶级的成员在发展生产力中积累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所起的作用，同样应该谨记于史。总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有功的。

本书虽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做了历史的、全面的分析，但没有专门提出考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是个缺陷。

总之，写书是给人看的，其价值如何要读者评说。近年来，坊间多俗物，学术著作问津者极少。此系从低生产力向高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难免之现象，不足为怪。待到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之时，这种现象会变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总要有人甘于寂寞，为维系文化的连续性，努力耕耘。这本书主要属于此类。当然，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研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仍不乏现实意义。所以，这本书又属于间接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之作。

（原载吴序光主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历史命运》，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评文纪事】

“序”中提出的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是个重要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不能不重点研究这个问题。后来，吴序光又申请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专门研究民族资本主义。这个课题，北大的沙健孙也在做。当然，难度很大，可能也不是一下子就做好了，而需要不断研究。

吴序光是北师大法政所教授。他对彭德怀很有研究，有许多研究成果。他的夫人李惠贤也是教党史的，与我同事多年，可惜老了患痴呆症和脑血栓，认不出人。吴序光只能服侍老伴，真是不容易。

2006年1月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走自己的路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走自己的路”，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从开卷到结尾贯彻始终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对此，邓小平多次做了表述：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

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2]

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六年来，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取得成功的。最近通过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的决定，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3]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63页。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95页。

我们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2]

走自己的路，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绩的一大法宝，是毛泽东、邓小平两位巨人的独特领导风格。

从1840年到现在，一百五十多年，中国人的奋斗目标，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而要达到这个目标，非常不易，关键是走什么路的问题。是亦步亦趋跟在别人后面跑，还是走自己的路？或者说，是为人附庸，还是独立自主？一百五十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艰难地寻找着这条富强之路。

1840年以后，随着外国资本的侵入，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同时开始了被动社会现代化过程。这种现代化的结果，必然是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化，毫无希望可言。因此，争取民族独立，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成为中国人的首要任务。

然而，当时在世界上只有一种步入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样板，即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要搞现代化就只能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造成中国被动现代化的正是外国资本主义，那么，你要学它当然得不到它的支持。许多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他们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可到头来总是失败。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而且，“先生老是侵略学生”。什么道理呢？原因很简单，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输入资本，并不是要中国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富强起来，成为与他们抗衡的强盛大国。资本贪婪的本性决定了他们的入侵，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3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7页。

只是为了占据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和占有这块富饶的原料产地。他们并非不想把中国沦为完全的殖民地，而是因为千百万中华儿女不畏强暴，浴血抵抗国外侵略者的可歌可泣的奋斗，使他们感到无力完全征服中国。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开头就碰到个挣脱外国资本主义控制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要实现社会现代化，能不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对此，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先驱者做了努力，但终究没有走出自己的道路，没有逃脱为人附庸的命运。

应该说，孙中山的思想和他的先驱者们有所不同。孙中山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病，想要搞中国的民主主义。他把自己提出的三民主义奉为“法宝”，以为是救世之“灵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确实充满了反侵略反压迫的革命精神，然而，其最大的缺陷是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纲领，幻想与帝国主义建立和平和友谊，他和黄兴、章太炎等共同制定的同盟会《对外宣言》宣布：“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偿款外债照旧担任”；“所有外国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这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主要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了纠正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弊病，他提出了五权分立的原则，即除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又加上考试权和监察权。在这方面，孙中山是费了心思的。他认为西方国家的选举和委任选拔官吏可以作弊，于是就想出一招，用独立的考试机构去制约。当然加上一层障碍比不加要好一点，但孙中山忘了考试也可以作弊。说实在的，五权分立和三权分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不能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看来，孙中山挖空心思想出来的主意，并不高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继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之后提出的“社会革命”纲领，是三民主义中最具思想特色的部分，是近代中国先进思想家提出的经济纲领中的一个最重要最先进的方案。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思想。对孙中山影响最大的是19世纪末美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单一税的土地国有学说。孙中山试图用亨利·乔治的理论来解决和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不均的“弊病”，实际上，亨利·乔治的学说，是防止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垄断，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扫清道路的理论。所以，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没有也不可能防止资本主义的“弊病”。至于他希望由此而达到社会主义，更是一种空想。

孙中山是伟大的。他以一颗赤诚之心，努力探索中国革命之路。可惜，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仍然没有找到出路，失败是必然的。

二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面临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但是，在道路的选择上增加了新的困难。

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教训，认定中国要改变被动社会现代化局面，不能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为此，他们引进马克思主义，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可这样一来，就增加了一项新的任务，即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由于在这之前，摆脱资本主义道路的榜样只有俄国，所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只能按俄国人革命的道路走下去。这当然就难于避免苏联共产党的脱离中国实际的指挥，特别难于避免照抄照搬十月革命所采取的具体的革命道路和经验。

还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初，李大钊就意识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不能脱离实际。1919年，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1920年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李大钊更加明确提出各国革命道路的差异问题。他说：“现代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有统一之倾向，大体的方向群趋于马克思主义。”“此倾向固吾辈所宜知，然各国所有的特色亦岂可忽略。”“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李大钊这些话，确实很有水平。可是，要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那是相当困难的。此后的事实证明，经过十几年的摸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从陈独秀到王明都没有能够解决好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陈独秀被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党的主要创建人。那么，为什么陈独秀没有找到中国革命之路呢？情况比较复杂。陈独秀为人很倔，有自己的主意，不爱听别人指挥，所以对共产国际的话有的听，有的不听。按说，他应该在摆脱共产国际的脱离中国实际的指挥方面，容易一些。问题是他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又有一个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模式，对共产国际